

印度佛教史
上

原始與部派

〔英〕渥德爾

(A. K. Warder)

著

王世安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印
度
佛
教
史

上

—— 原始與部派

[英] 渥德爾

(A. K. Warder)

王世安 著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印度佛教史：原始與部派、大乘與密教：全2冊 /
（英）渥德爾著；王世安譯．— 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
2013.12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17-7

I. ①印… II. ①渥… ②王… III. ①佛教史—印度
IV. ①B949.35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3）第222971號

印度佛教史（上下冊）

著者：[英]渥德爾

譯者：王世安

責任編輯：滕芸立人

出版發行：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刷：貴州創興彩印廠

開本：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張：20.75

字數：514千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ISBN 978-7-81126-617-7

定價：125.00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0851-5981027

本書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為 2013 年貴州省新聞出版局重點圖書，
并獲貴州省出版發展專項資金資助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西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成果則只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西元之初，佛教并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只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西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蘊。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說明

本書譯自英國學者 A. K. Warder 所著的 Indian Buddhism 一書。原書初版於 1970 年，此處之中譯本自 1980 年在印度德里出版的修訂版。

在英國學術界裏，本書是“印度佛教史”一類書之較新、且較引人注目的著作，茲摘譯兩部英文佛典目錄學者著述對本書的評語如次，以供讀者參酌。

一、“本書展現印度佛教傳統的全貌，從原始佛教起，到中觀學派為止（譯按：其實本書也論及中觀派以後的瑜伽行派及密教）。對初學者而言是一佳作。”（Guide to Buddhist Philosophy, p.11）

二、“本書應用原始數據以提供一部詳細的印度佛教史。全書重點置於宗教思想的發展。社會與政治情勢方面，則接受時興的說法。在信徒的實踐與通俗佛教方面，分量占得較少。作為參考書是有用的，但不宜作為印度佛教的導論。”（Guide to Buddhist Religion, p.5）

原書僅為一冊，但由於篇幅較大，我們將他分為上下二冊。上冊以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為主，下冊以大乘與密教為主。卷末的參考書目對有意深入研究者頗為有用，故一併刊載。

初版序

關於佛學的現代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數，讀者隨便涉獵幾本，會要相信，佛教內容原是八面玲瓏，見仁見智，可以各隨所好，人人異說。那樣的結論，雖然模糊，於知識無助益，可是直到今天還可以說是持之有故。是否佛教教義自始就是那樣模糊混沌，更加引起爭論。有許多像是權威的著作，就一般而論，關於佛陀的原始教義，作出懸殊甚大，有時完全相反的申述。至少很清楚，迄至公元 2 世紀，印度佛教有各種部派，雖然他們宣稱所傳揚的是地道佛陀教義，可是歧異非常巨大。在此情況下，現代作家，尤其是學者們，時常站在某一邊參與古代的爭論，或者利用極端謹慎的名義，有些人認為這是嚴格學院派的標志，宣稱我們根本不知道佛陀教導的是什麼，而且今後也不可能弄清楚。

既然寫了那麼多的書，而又沒有產生令人信服的結果，看起來對原始佛教是什麼的問題再提出一種解決方案，似乎會是徒勞無功的，筆者在一部早期著作中（《巴利文導論》p.11）曾經實際聲明放棄那樣的目的，建議堅持直接鑽研古代原文經典。然而人們對這個問題仍然要求一個答案，同時似乎有可能發現這個困難而誘人的答案。本書就是企圖作出一個答案，尤其是就現有的證據運用易為人們接受的演繹推理方法證明它的正確性。因此我們不得不讓這本書討論一下方法論，但也盡量限制在緒論部分，雖然它也影響了下文的表現，也許使這本書看起來更像羅列證明材料，而不

是發揮主題。想大略看看佛法教義的匆忙的讀者，如果願意姑且相信材料的真實性問題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緒論可以忽略不讀。

本書採取的形式是隨佛教在它的發源本土的發展與傳播作一番歷史考查。目的爲了表述佛教學說理論，而且給以闡明：歷史背景只在闡釋部分中略陳梗概，表明佛教思想家對之作出反應的環境情況和連續出現的思想觀念可以於其中照次序安排的歷史格局（這種次序有說明作用：當我們知道哪些人是某一位的直接繼承者，我們就更能夠看出他的旨趣之所在）。最廣泛的歷史概述是在開頭部分，意在表現佛陀時代之前的印度，然後引導到佛教由之生起的背景。

作者深切感謝德瓊教授（J. W. de Jong）和布列斯勒先生（C. D. Priestley）鑒定漢語三藏經文的引證材料，幫助比較印度的來源出處，以弄清他們對一些最基本術語的讀法解釋。同時還要感謝湯山先生（A. Yuyama）通知日本學者關於漢語本四阿舍所屬部派問題的討論，和東太爾教授（H. V. Guenther）對一些西藏資料的報導。

A. K. 渥德爾

1965年

第二版序

根據 1965 年本書初版完成之後的佛教研究，第二版有些修正。修正最大的是關於陳那的第一節；北川 (Kitagawa, 1965) 和服部 (Hattori, 1968) 輯集的梵文資料，使我們根據陳那自己的語言對他的哲學思想作出頗為全面的介紹成為可能。北川秀則 (Hidenori Kitagawa) 英譯《集量論》二、三、四、六卷，并附以梵文殘本，自 1972 年筆者邀請他任客座教授來多倫多時即已開始，可惜早逝，未能完成，對於這種冷門研究，真是一個嚴重的損失。

陳那屬於何部派的問題已經證明是特別難解決的。他的影響非常大，他的著作實際上遭到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一切哲學派別的竊取，被改削或曲解以適應他們的觀點。上座部在一方面，唯識宗在另一方面，似乎都接受他的認識論學說，在他們自己的部派內研究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繼承者法稱等人的著作，服部和北川教授，還有他人，遵照某些漢語傳統，曾經假定陳那是唯識論者，雖然這會引起解釋上不可克服的困難。在第一版中我們依據斯采拜斯基 (Stcherbatsky) 將陳那看做是無著的信徒，後者從唯心論退回到實在論，因而創立了一個新的宗派，我們稱之為因明派。我們接受了弗勞瓦納 (Frauwallner) 關於兩個世親的論文，自然得承認陳那是無著的兄弟第一個世親的弟子，雖然弗勞瓦納本人對於此點也頗含糊其辭，後來也不一致。弗勞瓦納給陳那著作編定年代，以

及陳那哲學從唯心論到實在論的演變的看法，我們當時也一樣接受了。然而關於《觀所緣緣論》的“對象”（境）的疑點使整個的演變看法發生問題，似乎證實了伐遮婆提彌濕羅（Vacaspatimiśra）和他人謂陳那像法稱一樣屬於經量部的說法。這樣一來大概可以推斷他是寫《俱舍論》的世親的弟子。作者的學生毛利雅（A. S. Moriya）在討論法稱的一篇博士論文中，對這個問題作過充分的研究，他判斷這兩個人都是經量部徒。我們第二版中採取了這個結論，並作出相應的修改，最重要的證據都加了說明。

Object（對象，客體，事物，境，外境……）這個字一向用來翻譯許許多多的梵文和巴利文術語，而它是我們弄清楚陳那觀點的起點，這個問題甚至在第一版出版之前已經引起進一步研究，在索引中增加了一條註解，結果所緣緣（ālambana）只是表示意識中的內在對象（內境）。這條註解是1968年憑各頁校樣編索引時作出的，後來擴展成爲一篇論文於1975年發表。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已經採入目前這一版，將ālambana（所緣）譯爲support（所依）等等。

關於 perception（知覺）（英語作家拿這個字用於各種不同的意義）和 sensation（感覺）的問題，以及關於更精確理解古佛教五蘊理論的問題，都關係到所有上面這些討論。似乎較接近的辦法是將“現量”，即通過感官的認識或知識譯爲 sensation（感覺），而將 perception 留給“想”（samjñā）這個古老的術語，“想”即是一件感覺經驗心理上的紀錄，後來又被認爲包括通過某種概念認識它的過程。在五蘊系統中，感覺或感官經驗，和五官都包括在“色蘊”（rūpa）中。所以像一向那樣將“受”（vedana）譯爲 sensation（感覺）是不適當的。根據各部派的解釋，“受”是對一個經驗的樂、苦、喜、憂、無記的反應，似乎很接近於 emotion（感情），本版就照此翻